

全球智库半月谈

美国经济真的恢复了吗？

中国经济放缓对东盟五国的溢出效应

G20 应当制定全球化的新章程

慢性自杀式的日本财政、货币政策

后奥运时代巴西经济仍困难重重

脱欧对英国银行业的影响

本期编译

安婧宜

郭子睿

侯书漪

李笑然

申劭婧

沈仲凯

司丹

谢晨月

伊林甸甸

张舜栋

(按姓氏拼音排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国际战略研究组

《全球智库半月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主编的中国社科智讯数据分析报告的组成内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为您提供。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主任	张宇燕		副主任	何帆
首席专家	张斌	开放宏观		
团队成员	刘仕国	欧洲经济	徐奇渊	中国经济
	吴海英	对外贸易	曹永福	美国经济
	冯维江	新兴市场	肖立晟	国际金融
	高凌云	对外贸易	熊爱宗	国际金融
	梁永邦	宏观经济	杨盼盼	国际金融
	匡可可	国际金融	魏强	国际金融
	茅锐	新兴市场	侯书漪	科研助理
	安婧宜	科研助理		

国际战略研究组

组长	张宇燕		副组长	何帆
召集人	徐进		协调人	彭成义
团队成员	李东燕	全球治理	袁正清	国际组织
	邵峰	国际战略	徐进	国际安全
	薛力	能源安全	欧阳向英	俄罗斯政治
	黄薇	全球治理	冯维江	国际政治经济学
	王鸣鸣	外交决策	高华	北约组织
	卢国学	亚太政治	王雷	东亚安全
	彭成义	中外关系	徐秀军	全球治理

田慧芳	气候变化	李 燕	俄罗斯政治
任 琳	全球治理	丁 工	发展中国家政治
赵 洋	科研助理	刘 畅	科研助理
周 乐	科研助理		

联系人: 侯书漪 邮箱: iwepceem@163.com 电话: (86)10-8519 5775 传真: (86)10-6512 6105

通讯地址: 北京 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1543 邮政编码: 100732

免责声明:

版权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所有, 未经版权所有人许可, 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 如有违反, 版权所有人保留法律追责权利。《全球智库半月谈》所编译的文章, 仅反映原文作者的观点, 不代表编译者、版权所有人或所属机构的观点。

目 录

世界热点

增长与负债 3

导读：政策制定者采用传统的核算方法分析债务的历史路径并预测未来走势。但是传统的核算方法低估了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本文提出一个简明的核算框架来充分考虑增长的重要性，量化分析了经济增长在爱尔兰和意大利的债务/GDP 路径中的角色，这两个国家历史的债务比例路径相似，但未来几年的趋势却完全不同。

美国经济真的恢复了吗？ 6

导读：这一论文试图回答了“美国经济是否复苏”这一问题。作者在现有的经济理论与公共政策中另辟蹊径，把矛头指向了美国政府，认为政府干预只会造成混乱而不能复苏经济，并且就这一观点展开了政治经济学分析。

美联储会启动加息吗？ 8

导读：本文探讨了美国央行在现实意义上能够做些什么，并考察了三条美联储不能加息的理由：第一，美联储希望提升国内短期利率可能面临金融阻力；第二，加息会带来一些不合意的后果；第三，在技术层面上可能就无法实现加息。

中国经济放缓对东盟五国的溢出效应 10

导读：中国经济经历了多年的快速增长，现在正向更加平衡可持续的增长方式过渡。短期来看，这可能会对它的贸易伙伴带来负面影响。本文研究了贸易，大宗商品价格和金融市场三种渠道对东盟五国的溢出效应，发现与中国贸易联系比较紧密的国家（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和大宗商品净出口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受的负面影响最大。中国经济增长每放缓 1%，它们的经济增长下降 0.2 到 0.5 个百分点。如果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与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叠加，负面影响将会更大。当然，中国经济的再平衡也会给东盟五国服务贸易带来机遇。

全球治理

G20 应当制定全球化的新章程 12

导读：G20 峰会即将于杭州召开，毫无疑问，这对于正处于“多事之秋”的全球经济而言意义重大。作者认为，G20 应当针对甚嚣尘上的反全球化浪潮，着眼于五大领域，为全球化进程制定新的章程。

经济政策

慢性自杀式的日本财政、货币政策 14

导读：日本政府执着的效仿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却不断失败，一直以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并没有使日本经济好转。此外，日本还面临老龄化和人口减少等问题，经济前景不容乐观。

奥地利经济放缓的原因 20

导读：奥地利曾一度是欧洲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近年来却面临衰落困境。究其原因，主要与价值链外包和本国创新不足有关，这使得奥地利在东欧的子公司难于真正惠及本国的长远发展。作者给出两个解决办法，其一是加快培育高素质人才，其二是制定有选择的移民政策，促使高素质人才进入本国。

后奥运时代巴西经济仍困难重重 22

导读：目前，巴西人将注意力从国家的混乱转移到里约奥运会上，过渡期总统米歇尔·塔莫和他的经济团队可能会在不断高涨的批评中收获两周的安宁。然而，一旦闭幕式结束，众多问题与不确定无疑将继续发酵。阻碍来自何方？巴西又应该如何应对？本文提出了一些思考。

脱欧专题**脱欧对英国银行业的影响 25**

导读：英国脱欧的公投为伦敦带来了特殊的不确定性。本文着眼于英国银行业在公投后面临的问题：未来在欧盟进行跨境活动的权利，对伦敦的灵活招聘的影响，将英国和欧盟的监管分开的可能性，以及对银行在全欧洲的盈利能力的影响。

英国应当离开欧盟关税联盟吗？ 27

导读：英国政府对于脱欧之后是否应留在欧盟关税联盟的意见出现分歧。虽然仍是欧盟的一个单一市场，但英国很可能希望离开关税联盟。但至少在短期内，英国应该继续与欧盟在 WTO 中保持一致，从而避免因脱欧引发的贸易中断。

本期智库介绍 31

增长与负债

Paolo Mauro /文 谢晨月/编译

导读：政策制定者采用传统的核算方法分析债务的历史路径并预测未来走势。但是传统的核算方法低估了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本文提出一个简明的核算框架来充分考虑增长的重要性，量化分析了经济增长在爱尔兰和意大利的债务/GDP 路径中的角色，这两个国家历史的债务比例路径相似，但未来几年的趋势却完全不同。编译如下：

传统分析债务/GDP 变化路径的框架是将其分解为财政盈余和利息增长。这对于思考债务比率的过去变化和未来路径非常有用。但是，该框架低估了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财政盈余本身已经反映了经济增长，没有必要再考虑经济增长的作用。因此，在政策制定和分析中，经济增长对债务变化的影响并没有内生化。本文提出了一个拓展框架。

拓展的传统框架

传统的框架认为，债务占 GDP 的比例的变化等于主要财政赤字（不包括政府债务的利息）加上初始债务比率乘以债务的平均利率与经济增长率（利息增长变化）之间的差额。而这里面的存在的误差来源于实体经济的债务纾困，私有化或者汇率的变化。我们对框架的拓展是考虑经济增长对财政盈余的影响。经济增长通过顺周期因素和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速影响债务比率。在没有政策行动时，可以假设收入与名义 GDP 同比例上升，支出与 GDP 平减指数同比例上升。

在该假设下，财政盈余占 GDP 的比重等价于上一年的财政盈余加上主要支出占 GDP 的比率与增长率之积，再加上残差。当然，源于经济增长的高收入给政府更多支出的选择，而快速的经济增长带动的收入增加也通常伴随着额外的支出。但是，提升支出是在经济增长背景下的政策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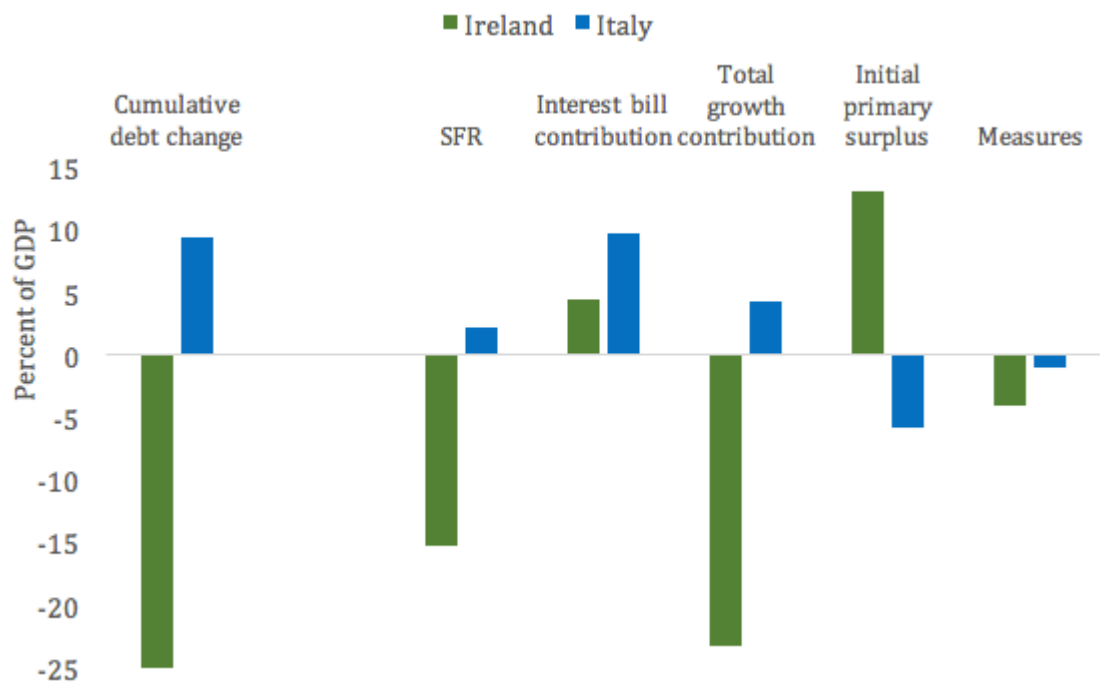
而且，在长期的经济增长背景下，政府不增加政府支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站不住脚。在经济繁荣的同时，私人部门的实际工资迅速增加，如果公共部门的工资不增加，将很难保留其公务员。同样，快速的经济增长会带来基础设施的额外需求，以适应不断上升的运输服务的使用。不过，政府可以选择，但这都会带来政府支出的增加。

在拓展的核算框架，债务占 GDP 比率的变化将等于初始总债务与支出之和的比重乘以增长率，加上债务的利息，减去初始的财政盈余和采取财政政策支出，加上相应的残差。这一拓展非常重要。例如，假设债务占 GDP 的比率是 80%，初始支出是 GDP 的 40%，那么到下一年，经济增长通过支出对债务的贡献是传统核算框架的一半。

一个例子

爱尔兰和意大利在 2012-2015 年的情形是最好的例子。在 2012 年底，两国债务占 GDP 的比例都大约在 120% 左右。在 2013-2015 年期间，爱尔兰的经济平均增长 4.8%，意大利经济增长-0.3%。三年之后，爱尔兰的债务占比下降到 95%，而意大利的债务占 GDP 的比例仍高达 132%。二者的不同主要取决于经济增长。而且，意大利的利息支出也比爱尔兰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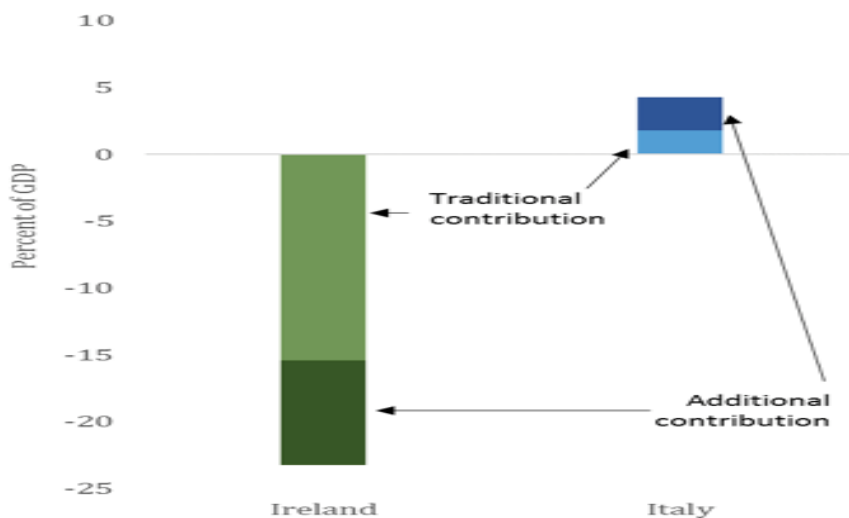
Figure 1 对爱尔兰和意大利的政府债务占 GDP 比例的变化累积贡献



数据来源：IMF (2016).

快速的经济增长会改善财政平衡。图 2 把经济增长的贡献分解为传统部分和额外部分。对爱尔兰而言，额外部分是 8%，大约是传统部分的一半；对意大利而言，额外部分是 3%，比传统部分要大。

Figure 2 导致债务占 GDP 的比例变化的传统和额外部分



数据来源: IMF (2016).

如例所述, 经济增长不仅影响债务占 GDP 的比例, 还会影响支出占 GDP 比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达经济体的债务变化也验证了该观点。

本文原题为“The full role of growth in accounting for changes in debt-to-GDP ratios”。本文作者 Paolo Mauro 为彼得森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6 年 8 月刊于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美国经济真的恢复了吗？

RICHARD E. WAGNER/文 朱子阳/编译

导读：这一论文试图回答了“美国经济是否复苏”这一问题。作者在现有的经济理论与公共政策中另辟蹊径，把矛头指向了美国政府，认为政府干预只会造成混乱而不能复苏经济，并且就这一观点展开了政治经济学分析。编译如下：

美国经济真的复苏了吗？

随着美国临近大选，政治候选人频频提及美国经济。希拉里·克林顿声称，复苏在奥巴马政府的领导下进展顺利。相比之下，唐纳德·特朗普声称，经济复苏一直疲软，经济增长的速度只有历史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特朗普还称，恢复经济要求较低的税收和减少监管，不同于奥巴马-克林顿计划要求增加税收和扩大监管。他们到底谁对呢？

政客的“机械论”

乍一看，候选人之间的对比明显。但其实是政客们的刻意作秀，他们的工作是使得经济发动机看起来平稳运行，这一动机推动政治家就经济问题发表各种解决方案。然而，这仅仅是表面性的。

这在大萧条时期更加显然，胡佛和弗兰克林·罗斯福的总统任期几乎完全围绕经济议题进行竞争。由此产生的新政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大地震。新政被视作重建经济的方案，而事实上并不是。正相反，大萧条本身是由1913年联邦储备银行的建立所引起的，美联储在20年代疯狂的信用扩张最终引起了大萧条。

因此，所谓机械论是站不住脚的。这一理论要求民众把经济看作简单的机械，坏了就去修一修。但是，经济行为体并非机械。他们是追求目标而行动的复杂行为体，政客试图去控制或引导如此数量的人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认识到经济的复杂性。

政治是一种特殊的“生意”

政治是一种生意，许多人依靠政治而生活。一部分人通过资金支持政党和候选人而谋生；而政客提出各种政策，就像一般的交易一样。

在市场上，公司通过股票价值和盈利能力评估自身的成功，公司也为市场提供服务，市场通过支付价格衡量其服务。而到了政治领域，政府依靠税收而活，并没有市场机制去检验其工作好坏。他们确实面临竞争，但是这种竞争往往演变为争吵和画饼充饥，而非真正的作为。

政治经济分析

在政治中，没有消费者来检验好坏，也很难去检验政治家的承诺是否真实。虽然政治需要竞争，但这种竞争不能带来最好的结果。政府依靠税收而非出售产品和服务获取收益，而且在这一过程中还不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此外，他们还有扩张权力的倾向。如果回顾 2008 年金融危机，这一“危机”的最大成功就是政治家试图向民众索要更多权力以应对所谓“危机”，这导致了政治权力的扩大。

举例来说，一些政治家说要对信贷市场更多监管，另一些却说要放松管制。其实这些都是“机械论”的观点，而避开了政治和商业公司的关系这一本质问题。信贷市场是由私有制、自由市场所构成的。银行家试图构建贷款组合以增加收益，因此会选择评估贷款者的信用。但是实际中，贷款者即便信用较差，只要支付较高利率，也可以获取贷款。更糟糕的是，政治官员也加入其中，但他们不追求银行更好的服务，他们追求银行满足其利益，去制定各种规章制度。银行在贷款时还不得不考虑诸如性别、种族等等其他政策要求。

小结

民众似乎认为保持经济增长是政治家的一个任务，并且总是如此。但是，在一个经济被摧毁的时候，复苏总是快速且有效。但是到了今天，复苏是缓慢且痛苦的。私人总是在经济衰退中找到机会，但是政府在经济危机中只会扩张其权力，并试图使自己回到社会中央。

最后我们来回答美国经济是否恢复。经济最终是会恢复的，社会有其自身的自愈能力。鲜有政府真的可以引导和控制经济，如果他们可以保持社会稳定、治安、保持较低的税率和行政公平，那么已经是做到最好了。由政治引起的经济混乱仍将是人类社会的常态。

本文原题为“Has the U.S. Economy Really Recovered? A Curmudgeonly Answer”。作者 RICHARD E. WAGNER 是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经济学教授。本文于 2016 年 8 月刊于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美联储会启动加息吗？

GERALD P. O'DRISCOLL JR./文 沈仲凯/编译

导读：本文探讨了美国央行在现实意义上能够做些什么，并考察了三条美联储不能加息的理由：第一，美联储希望提升国内短期利率可能面临金融阻力；第二，加息会带来一些不合意的后果；第三，在技术层面上可能就无法实现加息。编译如下：

本文探讨了美国央行在现实意义上能够做些什么，并考察了三条美联储不能加息的理由：第一，美联储希望提升国内短期利率可能面临金融阻力；第二，加息会带来一些不合意的后果；第三，在技术层面上可能就无法实现加息。

上述所谓金融阻力是指来自其他国家央行的措施。当下已有超过 20 家央行实行负利率政策，这本身使得更多国家陷入其中。如果美联储加息 0.25%，那就是与全世界的央行政策相抗衡。目前欧央行的日利率位-0.4%，而美联储则是 0.5%，已然存在 90 个基点的差距。同时，美联储加息会吸引资本流入到美元资产上，进而带来美元升值以及降息压力。

这也导致了上述的第二点：由于美元的升值，导致净出口下降；而美国已徘徊在每年 1% 左右的经济增长率，政策制定者不会允许因此而带来的经济放缓。所以，美联储加息虽然在理论上可行，但在政策上是不被接受的。

至于第三点，我们知道过去美联储事通过买卖国债来影响短期利率的。其目标是联邦基金利率，即向其他银行借贷的利率。如果要提升目标利率，美联储会卖出短期国债，当利率随之上升，银行有激励借款以获得更高的回报，因而联邦基金利率进一步提高。但问题是，在资产负债表上，美联储已不再持有短期资产，因而不能像以前一样对外出售。换言之，在技术层面，美联储无法加息。

去年 12 月，美联储将准备金利率从 0.25% 提升至 0.5%，并提供了 0.25% 的逆回购合约。这是想通过套利行为将联邦基金利率提升 25-50 个基点。然而，这一举措效果有限。尽管联邦基金利率得到了预期的提升，但在二级市场上短期国债利率甚至已低于 0.25%。此外，五年、七年期的通胀保护债券（TIPS）利率为负值。事实上，这里关键在于，我们并不清楚这种调控下的利率能否推动市场利率向预期的方向发展。

此外，目前对银行没有严格的限制，它们无需互相借贷来获得营利性资产，而是直接用多余的储备进行投资。因此，美联储或许能够改变联邦基金利率，但可能无法影响现实经济行为。事实上，当美联储给金融市场信号以提升利率，最终反而会引发一些混乱。当然，这也不是说提升 25 个基点就会颠覆整个金融市场。但是，美国想从之前持续几年的低利率、零利率中走出，同时不引起太大的经济、金融问题，这是绝不可能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美联储不能加息。

可以说，对于美联储及其他国家央行，并没有一个明显的方案来达到所期望的目标。全球复苏是缓慢的，对美国而言更是如此。美联储企图逆世界浪潮来提升利率，正如许多货币政策的拥护者一样，是封闭经济的思维模式。我们应该需要新的思路。

本文原题为“Can the Fed Raise Interest Rates?”。本文作者 GERALD P. O'DRISCOLL JR. 为加图研究所（Cato）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6 年 8 月刊于 CATO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国经济放缓对东盟五国的溢出效应

Allan Dizioli, Jaime Guajardo, Vladimir Klyuev, Rui Mano, and Mehdi Raissi /文 李笑然/编译

导读：中国经济经历了多年的快速增长，现在正向更加平衡可持续的增长方式过渡。短期来看，这可能会对它的贸易伙伴带来负面影响。本文研究了贸易，大宗商品价格和金融市场三种渠道对东盟五国的溢出效应，发现与中国贸易联系比较紧密的国家（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和大宗商品净出口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受的负面影响最大。中国经济增长每放缓 1%，它们的经济增长下降 0.2 到 0.5 个百分点。如果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与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叠加，负面影响将会更大。当然，中国经济的再平衡也会给东盟五国服务贸易带来机遇。编译如下：

当前中国经济正在实现再平衡，消费占 GDP 的比重不断提高，投资的比重持续下降。最近几十年，中国是驱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其 GDP 增速放缓以及 GDP 构成的变化会给周边国家尤其是其贸易伙伴带来显著的溢出效应。本文主要研究中国经济放缓与再平衡对东盟五国的溢出效应。东盟五国包括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新加坡，是与中国接壤，且相对比较开放的经济体。

中国经济放缓对东盟五国的溢出效应渠道包括贸易渠道，大宗商品价格渠道和金融市场渠道。

- 贸易渠道是最重要的渠道，因为中国是东盟五国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的重要伙伴。在 2014 年，他们对中国的商品贸易占到各自贸易总量的 10%—14%。贸易开放程度越高的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占比越高，比如新加坡与中国的贸易占到总贸易量的 17%。
- 大宗商品价格变化对大宗商品净出口国（印尼和马来西亚）带来负面影响，对大宗商品净进口国（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带来正面影响。中国是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中国对金属的需求占到全球需求的一半。中国的经济放缓，尤其是投资的下降，伴随着全球大宗商品供给的增加，给能源（石油和煤），金属以及农产品的价格带来下行压力。这会增加大宗商品净进口国的福利，降低净出口国的福利。
- 金融渠道对所有东盟五国都很重要。虽然，中国对东盟五国的金融直接溢出效应有限，但会通过全球金融市场来间接的影响。2015 年 8 月和 2016 年 1 月关于中国经济的不确定性导致 VIX 上升，东盟五国出现资本大规模流出和本币贬值。而且，金融渠道会强化贸易渠道和大宗商品渠道的作用。

模型分析表明，中国经济放缓和再平衡对东盟五国的溢出效应非常大。与中国贸易联系最紧密的国家（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和净大宗商品出口国（印尼和马来西亚）所受的负面影响最大。中国经济增长每放缓 1%，马来西亚经济增长下降 0.4 到 0.5 个百分点，是下降幅度最大的经济体。新加坡和泰国大概下降 0.2 到 0.5 个百分点。印尼和菲律宾由于与中国的贸易联系有限，受到的影响程度也较低。此外，中国经济的放缓如果伴随着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增加，那么溢出效应还会进一步放大。

东盟五国最近的经济状况确实和上述分析一致。自 2011 年，东盟五国的商品出口就开始下滑，在 2015 年下降幅度最大，这和中国经济放缓和再平衡时间刚好一致。最近几年，东盟五国的经济增长放缓，但从全球来看增长还是比较强劲的。很显然，东盟五国的发展不全是来自中国因素导致的。还有很多全球因素在起作用：全球贸易的放缓，影响大宗商品市场的异质性因素以及一些国内因素。

中国经济的再平衡在给东盟五国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带来机遇。中国进口正在从传统工业制品转向消费品。数据表明东盟五国正在扩大在中国进口消费品领域的市场份额，这会成为东盟五国新的出口增长引擎。此外，中国的服务进口也在增加，尤其是旅游业。泰国就受益于中国的出国旅游热，其它东盟国家如果能抓住这个趋势，也会大大受益。

本文原题为“Spillovers from China’s Growth Slowdown and Rebalancing to the ASEAN-5 Economies”。本文作者皆为 IMF 亚太部经济学家。本文于 2016 年 8 月刊于 IMF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G20 应当制定全球化的新章程

Alan Wheatley /文 张舜栋/编译

导读：G20 峰会即将于杭州召开，毫无疑问，这对于正处于“多事之秋”的全球经济而言意义重大。作者认为，G20 应当针对甚嚣尘上的反全球化浪潮，着眼于五大领域，为全球化进程制定新的章程。编译如下：

日益高涨的反全球化情绪对于世界经济来说，无疑是再清楚不过的威胁。伴随着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出格的竞选言论，越来越多的人对贸易、资本和人员跨境流动提出反对，因为他们并未从全球化的进程中获得任何好处。而即将于杭州召开的 G20 峰会则正好可以做出更多富有成效的努力，确保全球化的果实更加公平地为全世界所共享。

一套以“公平发展”为核心理念的“杭州宪章”，将会使得 G20 成员国获得明确的目标。尽管这将基于自愿的原则，但 OECD 国家将在以下五个领域做出表率，并对那些落后的国家施加一定的压力。

第一个领域是劳动力市场。近年来实际收入增长的停滞是造成西方国家不安情绪的根本因素，这与 1970 年代曾经发生过的劳动所得衰减的情况相当相似。资本获得的收入比劳动所分得的比例要高得多。更糟糕的是，劳动所得的衰减还伴随有快速增加的不平等趋势。政府应采取一系列政策手段来扭转这一趋势，包括使用税务杠杆来鼓励公司提高工资水平，提高最低工资或是给劳方赋予更高的议价优势。就连最保守的政治家如今也承认不平等的严峻程度。英国新首相已经向企业家发出呼吁，号召企业管理层提高工人工资，并压低管理层所得。

第二个领域是贸易。如今，许多国家的民间情绪都倾向于反对自由贸易。WTO 的多哈谈判已经无疾而终，因此 G20 必须避免这种向保护主义低头的情况再度发生。政府必须确保不再设立贸易壁垒，或是对外商投资施加歧视性政策。另外，各国政府也应该承诺，不蓄意贬值本国货币以获得贸易优势。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经常账户的不平衡问题。在一个需求不足的世界里，那些有巨大的外部盈余的国家总是被指责“偷走”了别人的增长和就业。G20 应当重申将各成员国的经常账户盈余限制在 GDP 4% 水平的政策目标。对此，中国并不应该感到不愉快。相反，中国的贸易盈余已经从 2007 年的 10% 降低到了不到 2.7%。与之相反，德国的经常账户余额令人不安地攀升到了 GDP 的 8.8%。各国应该各显神通来解决这一问题，当然，最稳妥的方法是刺激国内需求。由于货币政策的余地已经很小，政府应该抓住眼下融资成本处于历史性低点的机会，扩大公共品采购和公共投资。首要任务应当是提供更多的公共品，尤其是教育，从而令失去感强烈的阶层获得更多补偿。

同时，我们还要关注全球金融系统的问题。许多人反对全球化的诱因是他们的国家受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沉痛打击，并且至今没有恢复。因此，各国必须努力避免这样的悲剧再度发生。诚然，各国监管机构和立法者已经做出不少努力，但这些还远远不够。在有些国家，银行的准备金还不够充分。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影子银行的问题依然对实体经济有相当可观的威胁。为了防范金融系统的风险，G20 国家必须坚持倡导建立全球金融体系安全网，推进各国国内问题贷款的解决。

我们最后要强调的是税务问题。跨国公司利用法律漏洞合理避税是不少人反对全球化的重要因素。G20 国家必须继续努力，在 OECD 国家的倡导下，加强针对避税问题的应对措施。

G20 曾饱受“缺乏明确目标”的指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次杭州峰会对 G20 是个绝好的机会，G20 应当在本次峰会上推进以上提议，从而重建全球市场的信心。峰会对中国而言更是意义重大，中国可以藉此发挥日益强大的影响力，对全球经济秩序和发展路径施加影响。中国不应将上述提议视为制约其发展的诡计。与之相反，考虑到中国加入 WTO 以来 GDP 已增长超过五倍，如果全球化浪潮受阻，中国才将会是最大的受害者。

本文原题为“G20 Should Pursue a New Charter for Globalization”。本文作者 Alan Wheatley 为伦敦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贸易副研究员。本文于 2016 年 8 月刊于伦敦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慢性自杀式的日本财政、货币政策

Daniel J. Mitchell /文 郭子睿/编译

导读：日本政府执着的效仿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却不断失败，一直以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并没有使日本经济好转。此外，日本还面临老龄化和人口减少等问题，经济前景不容乐观。编译如下：

还记得 1993 年，由比尔·默里主演的景点喜剧电影《土拨鼠之日》吗？一名气象播报员，执行任务偶遇暴风雪后，停留在前一天却始终无法再前进一步，每天重复的同一天。

同样的故事正在日本上演。这次不是一个人醒来，重复同一天，而是政治家一次又一次地追求凯恩斯刺激政策却不断失败。

整个国家已经成为凯恩斯经济学的模仿者。日本政治家们使得奥巴马相比之下更像是一个财政保守主义者了。

华尔街日报描述了最近凯恩斯狂潮的细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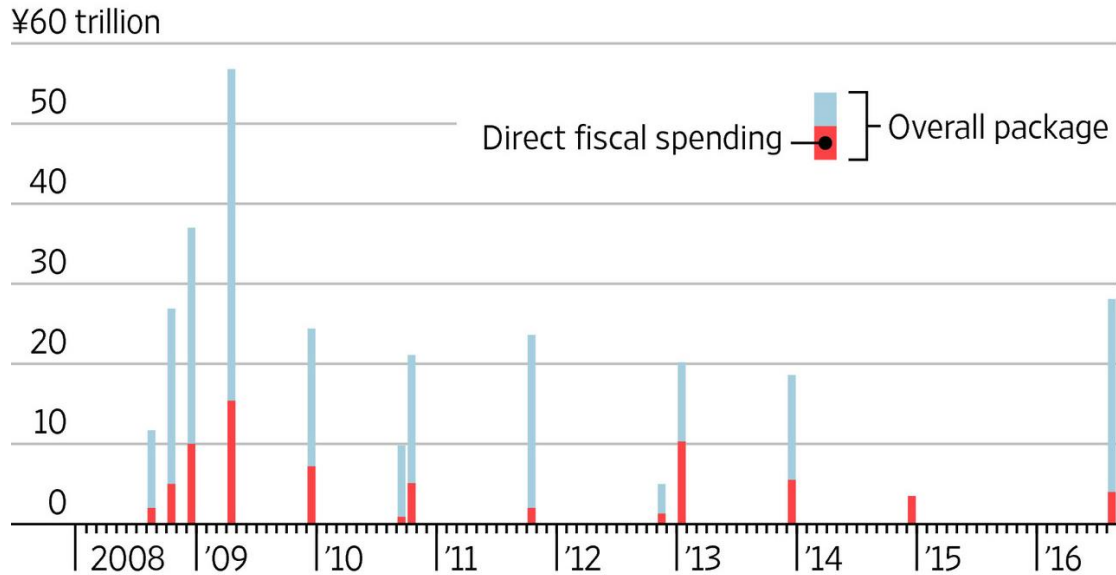
“日本内阁批准了一项政府刺激计划，其中包括 7.5 万亿日元（730 亿美元）的新支出，这是首相安倍晋三在拯救国家疲软经济的最新动向。这一支出项目，近年来已累计花费 28 万亿日元…试图为日本经济注入新动力…注资的项目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日本政府将为 0.22 亿低收入人群提供每人 1.5 万日元（约 147 美元）的现金补助…其他项目还包括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无息贷款…以及建设接待外国游客的新酒店等。”

正如我们所说，这只是一连串失败刺激政策的最新消息。

华尔街日报的下面这张图表显示了 2008 年以来发生了什么。

Try, Try Again

Japan's frequent stimulus packages typically include government-backed loans as well as direct spending to boost the economy.



Note: ¥1 trillion = \$9.84 billion

Source: Mizuho Securit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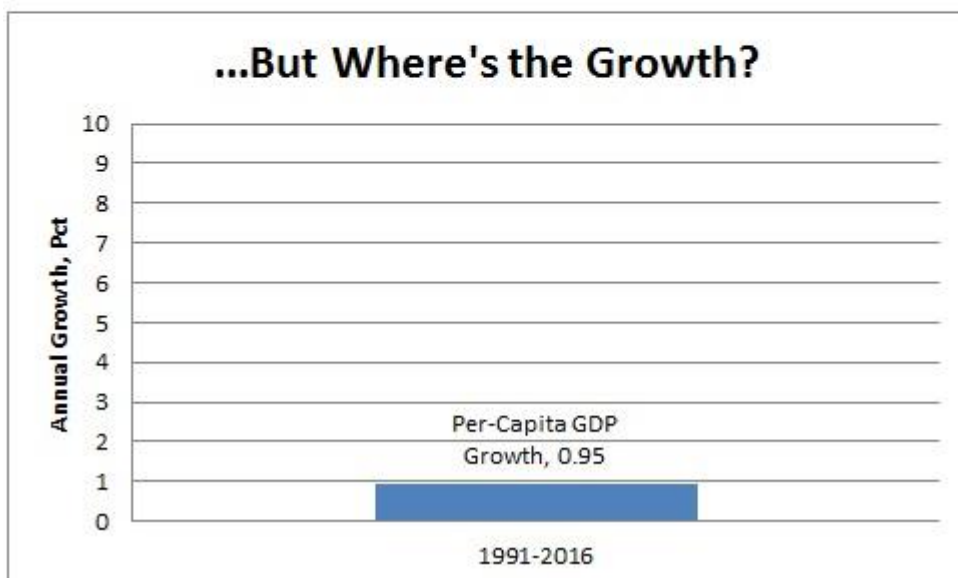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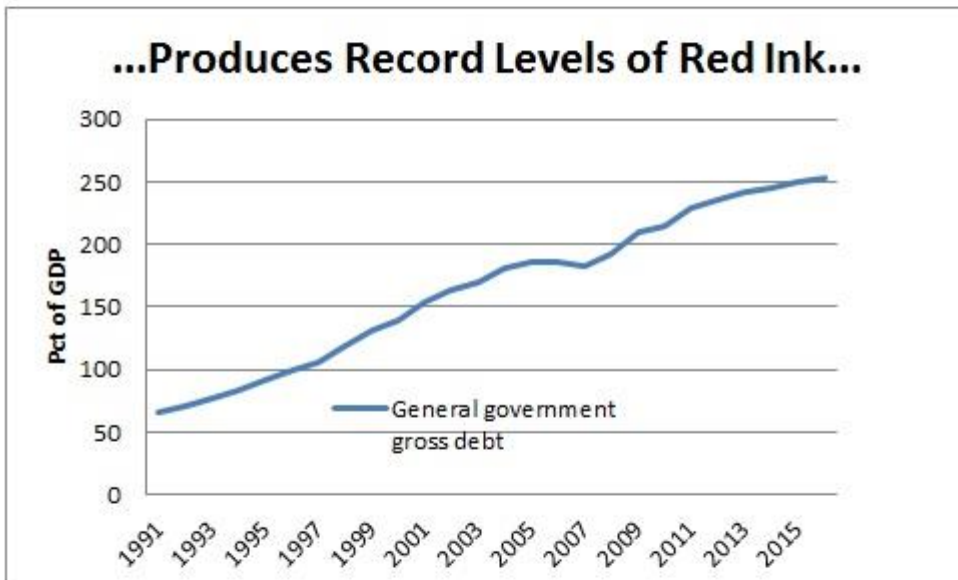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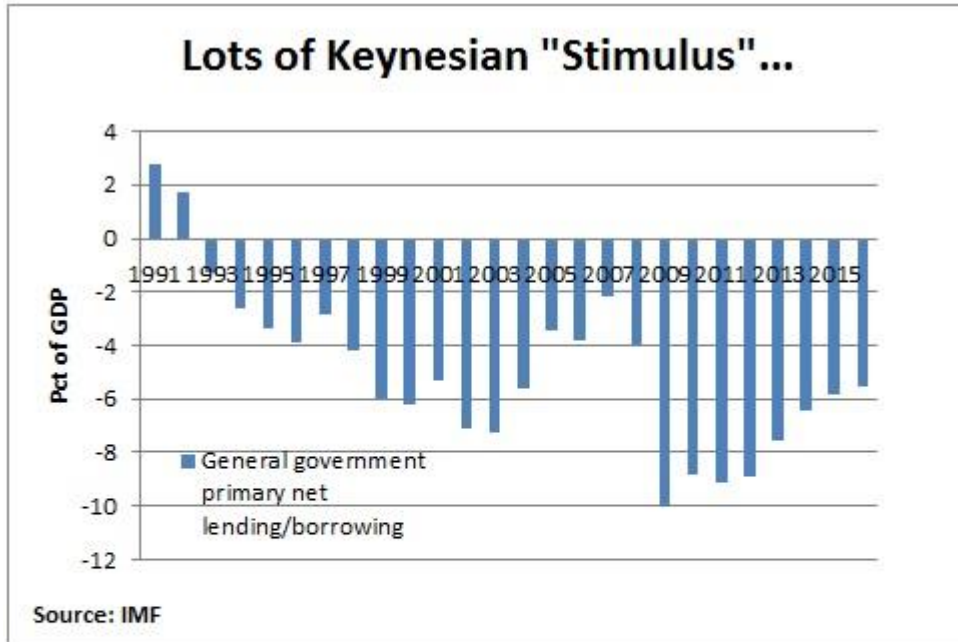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如果追溯到更早的时间，你将发现日本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就玩起了土拨鼠之日。

下面这一表格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列出了 1992-2008 年间各届日本政府提出的所谓的刺激计划。

Fiscal Year	Prime Minister	Total Size (trillion yen)	Major items (trillion yen)					
			Infrastructure	Tax cut	Land Purchase	SME	Housing investment	
1992	Miyazawa	-	-	-	-	-	-	
1992		10.7	5.7	-	1.6	2.1	-	
1993		13.2	6.6	-	1.6	2.4	0.8	
1993	Hosokawa	6.2	2.0	-	-	0.8	2.9	
1993		15.3	3.9	5.9	2.8	1.3	1.2	
1995	Murayama	-	-	-	-	-	-	
1995		-	-	-	-	-	-	
1995		14.2	9.1	-	3.2	1.3	0.5	
1997	Hashimoto	-	-	-	-	-	-	
1998	Obuchi	16.7	7.7	4.6	-	2.0	0.7	
1998		23.9	8.1	6.0	-	-	1.2	
1999		18.0	6.8	-	-	7.4	2.0	
2000	Mori	11.0	4.7	-	-	4.5	1.1	
2001		-	-	-	-	-	-	
2001	Koizumi	4.1	1.1					
2001	Koizumi	4.4	2.6			0.5		
2008	Fukuda							
2008	Aso	11.5				9.1		
2008	Aso	26.9				21.8	0.4	
2008	Aso	10.0		1.1				
TOTAL	1992-2008	186.1	Fiscal Policy Effectiveness					
TOTAL	1992-2000	129.2						

下面是我对这一讨论做的贡献。我找到了 IMF 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下载了政府借贷、政府债务和人均 GDP 增长率的数据。我想要看看到底有多少赤字开支，对负债和经济有何影响。可以看到，赤字飙升，私人经济停滞不前。



虽然我们不应感到惊讶。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胡佛和罗斯福，或者布什和奥巴马都没有用，为什么指望它在另一个国家会起作用。

顺便说，我忍不住评价一下 CNBC 对日本新刺激政策的报道。

“安倍政府上个月起草了一份刺激计划，以复苏低消费带来的经济疲软，尽管三年来“安倍经济学”提出了太多货币政策、支出和结构改革的承诺。”

确切的说，该作者在应该用“因为”一词而不是“尽管”。

除了一大堆迷失方向的凯恩斯财政政策以外，日本央行根据凯恩斯或货币政策进行了改革。

央行快速持股民营企业，下面一些文章来自彭博的报道。

“日本央行已经成为日经 225 平均指数中 81 家公司的前五名股东，有望在明年底成为其中 55 家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央行行长 Haruhiko Kuroda 上个月几乎将其年度 ETF 买入计划提高了一倍，采取了前所未有的举措振兴停滞的经济。…反对者认为央行人为抬高股价，影响了上市公司的效率，…货币政策当局这一巨大主体会使一些股东难以买卖股票，这导致了今年日本国债市场的震荡。…日本央行并不直接收购个人持股，而是通过 ETF 成为最终买家。…投资者担心日本央行的买入将给经营不善的公司搭便车的机会，挤出那些想要改善公司治理的股东。”

我不想假装自己是货币经济学方面的专家，但我无法想象这个故事会有个完美的结局。

为了防止你对日本经济的前景还不够悲观，请记住，日本这个国家正进入人口危机，洛杉矶时报报道如下。

“纵观日本，像 Hara-izumi 这样的老龄化村庄近年来慢慢空心化…日本人口在 2010 年达到 1.28 亿的峰值，到现在已经减少了 90 万居民（去年的人口普查证实）。日本的人口开始迅速减少，专家预测，到 2060 年日本人口将削减三分之一，只有 4 千万。30 年内，65 岁或以上的人口将占 39%。”

已经可以感受到相应的影响，而这只是人口波动的开始。越来越多的闲置建筑使得警察和消防员开始担心安全隐患。交通部门正在谈论哪些道路和公交线路值得维护…每年有 500 所学校关闭。…在 Hara-izumi，…农村人口已经非常稀少，野熊、野猪和鹿在街道上的出没越来越频繁。

不用说（或者说无论如何），如果仅有少量的劳动者支持越来越多的受助者，即使是中等水平的福利社会也将最终崩塌。

注：你将不会惊讶于日本政治家在 IMF 和 OECD 的财政方面提了很多坏建议。

注：也许我只是有些成见，但我一直以为日本人很明智，即使他们有一个臃肿和无能的政府。但是当你看到这个国家在监管政策上的愚蠢和政府的失职之后，我在想日本是不是和希腊有某些基因上的联系？

本文原题为“Japan’s Slow-Motion Fiscal and Monetary Suicide”。本文作者 Daniel J. Mitchell 为 Cato 高级研究员，研究方向是财政政策，尤其是税率改革，国际税率竞争和政府开始的经济负担，同时也是 Cayman Financial Review 的编辑委员。本文于 2016 年 8 月刊于 CATO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奥地利经济放缓的原因

DALIA MARIN / 文 安婧宜 / 编译

导读：奥地利曾一度是欧洲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近年来却面临衰落困境。究其原因，主要与价值链外包和本国创新不足有关，这使得奥地利在东欧的子公司难于真正惠及本国的长远发展。作者给出两个解决办法，其一是加快培育高素质人才，其二是制定有选择的移民政策，促使高素质人才进入本国。编译如下：

奥地利曾被誉为德国最成功的邻国，也是欧洲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是奥地利经济在 2012 年以来就处于低迷状态，GDP 增长只有 0.7%，这一数字仅仅高于希腊和芬兰。另外，奥地利的失业率激增，从 2010 年的 5% 涨到了如今的 10%。

这些变化的根源是共产主义陷落后奥地利对中欧与东欧的政策失误。最初，奥地利在欧盟向东扩展的过程中尝到了甜头。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壮大，奥地利公司在中东欧地区的投资额大幅提高，奥地利银行也在此开设了许多子银行。这一举措不仅推动了这些国家的现代化，也使得奥地利的经济飞速发展。

但是一个潜在的因素最终打断了发展的进程。虽然中东欧国家人均收入低，但劳动力素质却很高。与此相反，尽管奥地利更加富裕，却在劳动力素质方面有所欠缺。1998 年，16% 的中东欧国家人口（包括俄罗斯和乌克兰人口）拥有研究生学历，而这一数字在奥地利仅为 7%。因此，当奥地利公司在东欧投资时，他们不仅重新配置了低技能制造业的工作岗位，也配备了部分高端离岸产业链。

根据我的研究，从 1990 年到 2001 年，奥地利在东欧的子公司雇用的拥有研究生学历的职员是母公司的 5 倍。同时，子公司的研究人员也比母公司多 25%。

研究活动的重新配置降低了奥地利的经济增速，反而促进了东欧的经济。与此同时，新信息在商业活动中广泛传播。这些奥地利子公司创造的信息也是东欧经济能发展得如此迅猛的原因之一。

如今，在布拉迪斯拉发、布拉格和华沙等奥地利子公司的分布地区，人均收入已经超过了维也纳。匈牙利经济学家左思特·达瓦斯（Zsolt Darvas）的研究表明，以上三所城市的购买力平价在 2008 年就超过了奥地利。长期以来，奥地利一直是这些城市的参照系，这一转变极具意义。

然而，德国的经济增长却没有受到影响，这主要是由于三个原因。首先，在共产主义陷落后，奥地利重新规划了它的对外直接投资，面向东欧的投资占到了对外直接投资总数的 90%。而德国的这一数字在 1990 年仅为 4%，到世纪之交时才攀升到 30%。所以，奥地利受到东欧国家的影响更加深远。

第二，德国劳动力素质高于奥地利。在 1998 年，德国人口中拥有研究生学历的比例为 15%，是奥地利的二倍有余。另外，德国公司确实向东欧重新配置了

高端工作岗位，其程度却远远不及奥地利。德国在东欧子公司雇佣的高学历雇员是母公司的 3 倍，研究人员的数量也仅比母公司多 11%。

最后，奥地利的许多母公司本身就是外国公司的子公司，而德国公司的跨国公司则将公司文化传播给了东欧的子公司。这些德国公司雇用了更多的本国管理人员，使得他们的控制权加大。另外，大多数德国投资都着眼与已经成熟的技术，只有 8% 的对外直接投资涉及到高新产业。

与此相反，奥地利公司适应了东欧的本土文化，雇用了更多的本地管理人员。所以，这些子公司有更大的自治权力。这些公司缺乏一个保证子公司盈利惠及母公司的机制。

如果奥地利重塑辉煌，它会成为极具吸引力的创新发源地。为达成这一目标，奥地利公司应该雇佣更高素质的雇员。培训高水平劳动力当然是需要时间的。但足够幸运的是，奥地利还有另一个选择，那就是移民。澳大利亚的政策制定者可以选择遵循加拿大的经验，制定有选择的移民政策，促进更多高水平移民进入本国。

奥地利必须认识到，那些专家们宣称薄弱的环节，其实恰恰是经济复兴的希望所在。

本文原题为“[What’s the matter with Austria?](#)”。本文作者为 Munich 大学国际经济系教授。本文于 2016 年 8 月刊于 Brugel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后奥运时代巴西经济仍困难重重

Monica de Bolle /文 申劭婧/编译

导读：目前，巴西人将注意力从国家的混乱转移到里约奥运会上，过渡期总统米歇尔·塔莫和他的经济团队可能会在不断高涨的批评中收获两周的安宁。然而，一旦闭幕式结束，众多问题与不确定无疑将继续发酵。阻碍来自何方？巴西又应该如何应对？本文提出了一些思考。编译如下：

巴西已经面临连续两年 GDP 下降，这标志着这个国家历史上最严重的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巴西政府最近修订了 2016 的 GDP 指标，保守估计为 3.3%，这比之前的预期稍有下降。2017 年，IMF 预计增值只有 0.5%，不过一些市场参与者认为活跃程度将扩张 2%。面对这种局面，政策将首先落在通过基金财政措施来修复债务可持续性、处理不断恶化的财政等方面。同时，政府需要重新整顿巴西的大众银行，并决定是否需要对一些在过去几年内因为贷款拖欠造成资产负债表膨胀的公共借贷者进行注资或政府参与的重新资本化。即使这些改革不能如预期一样完全执行，中央银行业应该尽快考虑降低利率。

没有清晰的增长源

然而，以上对 GDP 的预期更多的基于愿景而非现实。现实是，很难从任何地方找到增长点。家庭债务居高不下；失业率不断上升——1160 万巴西人没有工作，裁员仍在继续；虽然通胀略有下降，家庭预算也因为坚挺的价格和不断下降的工资而不断缩紧。投资也没有回暖迹象：公共投资因为开支而受限，同时私人投资也因为不确定的环境——特别是政治不确定性——和高利率而持续受损。出口驱动型复苏也不太可能。尽管出口因为最近汇率贬值等原因有一点反弹，但是巴西整体缺乏竞争性及其在全球贸易中的不利趋势还是限制了它的出口。

进步的标志

肯定的是，巴西从今年初开始就有了显著进步。政治方面，尽管有传言说现过渡期总统塔莫尔（罗塞福的前副总统）和他的政党，前身是工人党（PT）的巴西民主运动党派（PMDB）策划了政变，弹劾总统罗塞福的进程依旧在国家宪法允许的范围之内推进，避免了严重的体制危机。腐败调查已经揪出一批政治家和商人，并由此加强了巴西的法律制度。自五月当选为巴西的过渡期总统以来，塔莫尔已经推动了彻底检查，不仅包括经济团队，还有巴西国家发展银行

（BNDES）和巴西石油公司。巴西石油的股价因此反弹，BNDES 也有望削减资产负债表中的贷款。

塔莫尔的新财政部长和经济团队也宣布了一系列的关键财政措施，包括设定开支增长上限，社保改革以及其他控制开支的方案。市场参与者对这些举措持乐观态度，巴西的资产也因为国民对经济治理的期待而有所反弹。

功能失灵的政治阻碍了财政政策

然而，一系列的倒退暗示了更大的担忧。奥运结束之后——这也很有可能与罗塞福确定无疑的退位同时发生——现实将更加残酷。财政政策在功能失灵的政治环境中面临挑战。目前，塔莫尔已经不能通过合法化设定开支上限的宪法修正案。这位过渡期总统也承认了提高公务人员工资的压力，并且他的社保改革方案也受到强烈阻碍，而这些都是对修复中期财政可持续性至关重要的。

此外，最近一项向各州——尤其是因为筹办奥运会而早已超出财政上限的里约和巴西最大州圣保罗——提供债务免除的计划遭受了尖锐批评。一开始，政府要求各州将关键开支项目包括在国会批准的开支上限内以换取国家提供的债务免除。但是，最近这项提案放松要求，意味着各州可能最终在不遵守开支上限的情况下获得债务免除。与各州的协议最终将耗费多少预算尚不明确，但是目前开销很可能超过财务部之前的估计以及 2016 和 2017 年财政目标中包括的内容，二者都相当于 GDP2% 以下的财政赤字。

货币政策：对中央银行的更大信心

政府提出的财政和社保改革计划和私有化国家资产来提高经济效率、创造额外预算收入的计划被广泛接受，而且无疑也是正确之举。然而却缺乏对货币政策的关注。在新的领导层下，鉴于经济仍面临诸多困扰，特别是财政方面的种种不确定性，中央银行最近决定将年利率保持在 14.25%。但是，由于因投资者对新的中央银行团队的盲目信心而改善的市场环境，通胀预期已经大幅下降。考虑到 12 个月的预期，实际利率最近由年初的 6.5% 疯长到 9%。在一场衰退中如此剧烈紧缩的货币环境意味着保持利率不变不再是明智之举。尽早降低利率而不是等待政府和国会的财政举措可能会更好的缓和家庭和公司债务，这相当于 GDP 的 8%。如果通胀预期保持低迷，通过降低利率中央银行也可以降低投资成本。

如果中央银行在利率方面表现更果断，通胀预期就不会恶化。一方面，持续的衰退可能限制认为通胀未来上升的感知，就像现在一样。另一方面，鉴于新经济团队和中央银行不会受政治影响的看法坚定了市场信心，投资人会对利率削减更加信任。最后，最近中央银行的调查显示，许多市场参与者已经在期待利率的逐渐降低。因此，如果中央银行将货币政策导向不同轨道，经济复苏将更快出现。阻碍仍然存在，但是它们对巴西目前经济劣势的危害将变小。

本文原题为“Brazil: Too Many Hurdles after the Olympic Games”。本文作者 Monica de Bolle 为 PIIE 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也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兼职教授和里约热内卢天主教大学的教授。本文于 2016 年 8 月刊于 PII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脱欧对英国银行业的影响

Patricia Jackson /文 侯书漪/编译

导读：英国脱欧的公投为伦敦带来了特殊的不确定性。本文着眼于英国银行业在公投后面临的问题：未来在欧盟进行跨境活动的权利，对伦敦的灵活招聘的影响，将英国和欧盟的监管分开的可能性，以及对银行在全欧洲的盈利能力的影响。编译如下：

英国脱欧的公投无疑带来了不确定性和市场波动，尤其是给伦敦——欧盟最大的金融中心带来了特殊的不确定性。英国银行业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当英国已不再是欧盟的成员，英国在欧盟进行跨境活动（所谓的“护照”）的权利。另一个是英国脱欧对于伦敦的灵活招聘的影响。进一步的问题是，英国监管远离欧盟的可能性。最后一个问题是对银行在全欧洲的盈利能力的影响。

护照

目前，在英国建立的银行——归属于英国的或是海外银行在英国的子公司——有权在欧盟和欧洲经济区（EEA）的其他国家设立分支机构、开展跨国活动。现在判断脱欧谈判后这些权利是否能保持下去还为时过早。如果权利得不到维护，那么很多银行如果希望进入 EEA 进行跨境活动时，就不得不重新评估他们的欧洲业务结构。然而，在决定改变之前，银行需要考虑在多大程度上他们可以利用现有的在欧盟其他国家的子公司实现他们的护照权利。对在伦敦有子公司的主要非欧洲银行样本的快速调查表明，大约四分之三在欧洲其他地方有子公司。

此外，欧盟金融工具市场法规确实允许欧盟以外的银行有跨境的权力来进行交易，建立结算所、清算及结算系统，并且，第三国等价条款允许进入欧盟的护照来应对专业客户。第三国等价条款要求对多个领域的评估，例如授权和监督，覆盖市场滥用的规则等。

因此，问题更多关于非专业客户的进入，而关于这个，很多情况下现有的子公司可被用来提供护照。

监管

银行业的一个担忧是，英国的监管可能脱离欧盟的控制，增加成本和复杂性。然而，银行的资本监管以巴塞尔协议为基础，使英国不太可能在这一领域脱离欧盟。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运用起来可能会出现一些差异，但在实施方面，英国已经有了一个独特的方法。事实上，欧洲央行主导的单一监管机制发生的变化，在一些领域里正倾向于使欧洲大陆更接近英国的方法，如全面风险评估和资本充足等。英国也一直有一个独特的方法来进行监管。

伦敦作为金融中心的吸引力

接下来要提出的关键问题是，伦敦作为一个金融中心的持续吸引力。伦敦的吸引力一直集中在语言、规模、与金融中心的不同方面的相互联系，其国际化的性质和可用的技术，以及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是现代英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获得来自世界其他国（包括欧盟）的熟练劳动力的渠道将需要保障。历届政府将不得不考虑，是什么使伦敦作为一个金融活动的家有吸引力，以及如何鼓励这些方面。这意味着继续加强基础设施，考虑税收问题等。如果伦敦能够继续保持吸引力，那么批发活动可能继续涌向伦敦。

银行的盈利能力

对于银行业来说，眼前更为急迫的可能是英国脱欧对盈利能力的短期影响。非常低的利率环境可能会持续更长的时间，并有可能进一步下降。不确定性正在使得低增长和经济显著减速变得可能。这不仅将对在英国的银行，而且对在欧洲的盈利能力产生影响。银行已经承受了来自投资者的压力，增加了股票的回报率，现在股价已经大幅下跌。到目前为止，投资者还不能接受更好资本化的银行在提升安全性的同时降低股票的回报率。随着银行努力降低成本和在无法得到足够的回报时退出，盈利能力方面不断增加的压力将会进一步推动商业模式的变化。在这样的环境中，进一步提出了改变银行资本要求的巴塞尔协议 III 非常无益。英国已经计划通过减少外部监管的缓冲区来抵消他们的减少。欧洲大陆没有这个机会，因为外部监管的使用是有限的，因而能够得到的缓冲也是更少的。

本文原题为“Brexit – what happens to banking?”。本文作者 Patricia Jackson 是 Atom 银行的非执行董事、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高级顾问和 CEPR 的受托人。本文于 2016 年 7 月刊于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英国应当离开欧盟关税联盟吗？

André Sapir / 文 司丹 / 编译

导读：英国政府对于脱欧之后是否应留在欧盟关税联盟的意见出现分歧。虽然仍是欧盟的一个单一市场，但英国很可能希望离开关税联盟。但至少在短期内，英国应该继续与欧盟在 WTO 中保持一致，从而避免因脱欧引发的贸易中断。编译如下：

英国是 1948 年成立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的创始国成员。与其他欧盟成员国一样，英国在加入欧盟之后仍保持了在 GATT 的成员身份，并且加入了 1995 年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因此，除了要遵守 WTO 所有成员普适规则之外，英国还需遵守个别 WTO 成员国制定的例外条款。

这些例外条款列于名为“减让时间表”的文件中，文件中包含了成员国在签订多边贸易协议时提出的关税减让以及其他承诺。对于商品贸易，这些减让主要包括进口关税，称为“最惠国”关税。成员国必须对其他所有 WTO 成员国采用平等的关税政策。

一般来讲，WTO 成员国只在两种情况下被允许偏离非歧视原则，采用比最惠国关税更低的关税。一种情况是加入了自由贸易协定（FTA）或关税联盟（CU）。其中 CU 要求有共同对外关税。另一种情况是为了经济发展而采取的单边贸易优惠。如普遍优惠待遇（GSP）允许发达国家以较低的关税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商品。

虽然是 WTO 成员，但英国没有自己的减让条款，而是包含在欧盟减让条款之中。而欧盟是 WTO 中唯一的关税联盟。

欧盟在 WTO 中有着特殊地位，它是一个特殊的关税联盟。欧盟成员国不仅有共同对外关税，还采取覆盖整个贸易政策工具的共同商业政策，尽管它们单独来讲也都是 WTO 成员。

因此，英国目前的贸易安排如下：

- 与所有的欧盟国家以及与欧盟签订 FTA 或 CU 的国家实行自由贸易
- 以低于最惠国待遇的关税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商品，这些发展中国家指的是欧盟列为普遍优惠待遇的国家
- 与其他 WTO 成员国采取最惠国待遇。

目前，欧盟已经签订了 30 个自由贸易协定和 2 个关税联盟，签订国家包括 WTO 的 56 个成员国或观察国。这 32 个协定占欧盟贸易的三分之一。同时，欧盟正与一些其他 WTO 成员国（包括日本和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这又占欧盟贸易的三分之一。需要注意的是关税联盟协定是一个例外。欧盟与 WTO 其他

成员国现有或正在签订的贸易协定都是自由贸易协定，欧盟-安道尔和欧盟-土耳其除外。

需要强调的是，欧盟与其他贸易伙伴签订的协定中，自由贸易协定远多于关税联盟，这些贸易伙伴包括冰岛、列支敦士登和挪威等属于欧盟经济区（EEA）的国家，以及瑞士。

因此，尽管与欧盟保持紧密经济联系，这四个共同组成了欧洲自由贸易同盟（EFTA）的国家却不属于欧盟关税联盟。他们可以与欧盟以及互相之间自由贸易，但却不属于欧盟关税联盟，因此可以自由地与第三方国家签订贸易协定。

表 1 展示了当前 28 个欧盟国家之间、欧盟和其他 19 个欧洲理事会的成员国之间签订的贸易协定。该表反映出无论是欧洲单一市场还是欧盟关税联盟，目前都只留给欧盟成员国（还有地理上在欧盟中的三个小国家：安道尔、摩纳哥和圣马力诺）。其他非欧盟国家要么属于单一市场（冰岛、列支敦士登、挪威和瑞士），要么属于关税联盟（土耳其），要么都不属于（其他）。

表 1：欧盟和非欧盟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

欧洲理事会成员	欧盟单一市场现状	WTO 与欧盟贸易现状
欧盟 28 个成员国	正式成员	关税联盟
冰岛	正式成员	自由贸易区
列支敦士登	正式成员	自由贸易区
挪威	正式成员	自由贸易区
瑞士	准成员	自由贸易区
阿尔巴尼亚	非成员	自由贸易区
安道尔	准成员	关税联盟
亚美尼亚	非成员	最惠国
阿塞拜疆	非成员	最惠国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非成员	自由贸易区
格鲁吉亚	非成员	自由贸易区
马其顿	非成员	自由贸易区
摩纳哥*	准成员	事实上关税联盟
黑山共和国	非成员	自由贸易区
摩尔多瓦	非成员	关税联盟
俄罗斯	非成员	关税联盟
圣马力诺*	准成员	关税联盟
塞尔维亚	非成员	自由贸易区
土耳其	非成员	关税联盟
乌克兰	非成员	自由贸易区

注：标星国家不是 WTO 成员国或观察国。

来源：作者整理

最后要说明的是，正如属于欧盟单一市场意味着适用欧盟条款和规则，属于欧盟关税联盟意味着适用欧盟的商业政策。

然而，对于像土耳其这种与欧盟有关税联盟的非欧盟国家来说，现实并非如此。由于不属于欧盟，土耳其不能参与欧盟商业政策的制定，也不愿意在真正加入欧盟之前就完全放弃贸易政策自主权。

因此，欧盟-土耳其关税联盟实际上是关税联盟和和自由贸易协定的结合物。在大部分工业品和一部分农产品上土耳其接受了欧盟的外部关税；纺织产品上与欧盟外国家和欧盟自由贸易伙伴国采取附加关税政策；采取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等贸易壁垒，与欧盟在产品 and 适用国家上完全不同；同时，土耳其和一些欧盟自由贸易伙伴还未形成自由贸易协定（包括墨西哥，南非和乌克兰）。

土耳其不参与欧盟共同商业政策的制定，意味着它被完全排除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之外，尽管 TTIP 将对土耳其产生重大影响。这造成欧盟和土耳其之间的紧张局势。

那么这对英国意味着什么呢？一旦离开欧盟，即使它与欧盟单一市场联系紧密，英国必将希望离开欧盟关税联盟。离开欧盟，却留在欧盟关税联盟意味着英国在制定自身贸易政策上的自主权将受限甚至丧失。目前，土耳其对这一状况是接受的，但这是因为它想要加入欧盟，可以接受欧盟相关政策。如果土耳其没有加入欧盟，必将希望重新获得贸易政策制定自主权，并将欧盟-土耳其关税联盟变成自由贸易协定，即使这将带来一些经济成本。

离开欧盟关税联盟意味着英国可以在保持与欧盟自由贸易的情况下，与第三方国家制定贸易政策。然而，英国已经以欧盟成员国身份与一些第三方国家部署相关事宜。在与这些国家或者中国等其他国在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之前，英国需保留 WTO 的减让条例，制定最惠国关税等。只有制定了最惠国关税，英国才能与其他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与 WTO 的 160 多个国家签订减让条例是一件很耗时的事情。欧盟成员国将贸易谈判交给了欧盟，自己没有制定权。因此英国在正式离开欧盟之前需要与欧盟成员国达成协议，开启自主谈判。即使是这样，在 WTO 内签订协议仍需要时间，同时延缓英国启动双边贸易协定制定的进程。

因此，对英国来讲，唯一现实的选择是向 WTO 成员国承诺欧盟的减让条例在今后同样适用。原则上，这对 WTO 成员国没有太大影响，因为他们与英国的最惠国待遇没有变。但值得提醒的是，WTO 是靠共识运作的，一些大型经济体可能希望在进入英国市场方面得到优惠。他们希望英国在脱欧后会有所不同，因此需要重新权衡英国脱欧的利弊。

然而即使 WTO 成员国同意英国保持欧盟的贸易政策，英国国内的一些利益团体可能也不会接受，他们希望以脱欧为契机改变欧盟的一般外部关税。在欧盟一些产品可能是享受最惠国待遇的零关税，而

这些利益团体可能希望提高最惠国关税水平。另外，一些产品，特别是食品类产品，其欧盟的最惠国关税水平较高，英国可能希望降低。

英国政府最好避开这些要求，至少在短期内保持欧盟的外部关税。同时说服 WTO 成员国不要改变其进入英国市场的相关条例。

如果 WTO 成员国尽快接受英国保留欧盟贸易政策这一做法，英国将可以很快启动双边贸易政策的谈判，包括那些已经与欧盟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如韩国、墨西哥、挪威、南非和瑞士）或是关税联盟的国家（尤其是土耳其）。英国还可能希望与那些正在与欧盟谈判的国家签订贸易协定（如印度、日本和美国）。最后，英国还需考虑是否保留 GSP，并决定在何种情况下与哪个国家采用这一政策。

保守估计脱欧将给英国贸易政策带来改变，并不可避免的打扰贸易进程。唯一的方法是至少在最开始不要破坏原有的在欧盟时的贸易政策。然而，这不仅取决于女王陛下政府的意见，还需要 WTO 成员国的同意。

本文原题为“Should the UK pull out of the EU customs union?”。本文作者 André Sapir 为 Bruegel 的高级研究员，同时也是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经济学教授和前欧盟委员会主席经济顾问。本文于 2016 年 8 月刊于 Bruegel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本期智库介绍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简介：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于1983年。它包括七百多位研究人员，分布于28个国家的237家机构中（主要是欧洲高校）。其特点是提供政策相关的学术研究、并关注欧洲。Voxeu.org是CEPR的门户网站，受众为政府部门的经济学家、国际组织等。它的文章多为与政策相关的工作论文初稿，比财经报纸专栏更为深入，同时比专业学术文章更加易懂。

网址：<http://www.voxeu.org/>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简介：IMF于1945年12月27日成立，为世界两大金融机构之一，职责是监察货币汇率和各国贸易情况、提供技术和资金协助，确保全球金融制度运作正常，其总部设在华盛顿。IMF主要通过监督、贷款以及技术援助和培训三大职能来促成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IMF的工作论文及其他出版物在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方面拥有巨大影响。

网址：<http://www.imf.org/>

Brussels European and Global Economic Laboratory (bruegel) 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

简介：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成立于2005年，是主要研究国际经济的独立、非理论（non-doctrinal）的智库。致力于通过开放、基于事实并且与政策有关的研究、分析和讨论，对欧洲及全球经济政策制定作出贡献。bruegel的成员包括欧盟各国政府以及一些领先的国际公司。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bruegel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6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9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3名。

网址：<http://www.bruegel.org/>

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简介：由伯格斯坦（C. Fred Bergsten）成立于1981年，是非牟利、无党派在美国智库。2006年，为了纪念其共同创始人彼得·乔治·彼得森（Peter G. Peterson），更名为“彼得·乔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PIIE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0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4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1名。

网址：<http://www.iie.com/>

Cato Institute 加图研究所

简介：加图研究所位于华盛顿特区，成立于1977年，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型智库之一。加图研究所以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为思想根基，致力于“扩展公共政策辩论维度”，通过独立、超越党派的公共政策研究和讨论，旨在“恢复小政府、个人自由、自由市场以及和平的美国传统”。加图研究所的政策分析曾经影响过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的政策。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加图研究所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4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3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8名。

网址：<http://www.cato.org/>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 (Chatham House)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简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成立于 1920 年，位于伦敦圣詹姆斯广场著名的查塔姆大厦内。是目前英国规模最大、世界最著名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之一。其宗旨是“推动个人和组织对日益复杂多变的世界进行全面研究，并提供政策参考。”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与英国政府、企业、媒体和学术界均有着广泛的联系，对政府的外交政策有一定的影响。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hatham House 在全球（含美国）30 大智库中列第 2 名，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6 名，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4 名。

网址：www.chathamhouse.org/